

CHAOZHOU-SHANTOU CULTURE RESARCH

潮學研究



14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韩山师范学院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学研究

第14辑/黄挺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2

ISBN978-7-5360-5513-1

I. 潮… II. 黄… III. ①潮州市-地方史-研究-文集
②汕头市-地方史-研究-文集 IV. k29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6067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出版发行：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华彩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新工业区南北大道)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75印张

字 数：225,000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册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史料与视角

- 岭东长老会中文档案之价值解析胡卫清 1

明代中期潮州地方士绅的兴起与卫所地方化

- 以潮州大城守御千户所为例杨培娜 28

城濠疏浚和社会变迁

- 以明清时期潮阳护城河为例陈泽文 51

1688年漂流在朝鲜济州岛的潮州出航船考···朴现圭 74

18世纪末闽粤民人“赎单出洋”问题

- 以“吧国公堂”档案中有关樟林
船的个案为中心.....黄鹤绵 91

陈坤《如不及斋丛书》与清代咸同年間

- 潮州社会谢 湜 111

从金石碑文与官方档案管窥19世纪

- 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陈剑虹 155

争地案与各方利益在外交上的折冲

- 光绪年间德国鲁麟洋行汕头
海坪争地案略考周修东 173

出阁：乾泰隆土地及商业文书所见的清末 民初的潮汕妇女	蔡志祥 205
解读《高资政公阡表》 ——谈香港元发行的转让	黎道纲 219
从岭东佛学院的创办看 近代潮汕佛教面对的问题	马木池 237
商人、商会和法院 ——从1930年代汕头商事纠纷的一个判例说起	陈海忠 266
空间、知识与文本 ——围绕粤东潮客文化生成的人类学研究 ...	河合洋尚 282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几本英文版汕头话 工具书和教材及其价值	林伦伦 293
汲约翰的潮汕方言研究及其 历史文化价值	蔡香玉 306
潮汕方言词选释	陈伟武 320
粤东闽语-n（-t）韵尾类型的地理分布 及成因	吴 芳 328
编后语	337

史料与视角

——岭东长老会中文档案之价值解析

胡卫清

中国近代基督教史之学界近年开始尝试改变其研究范式与视角，即从重视外来的差会传教研究转向重视本土性因素的研究，试图去“发现”和构建真正意义的“中国”基督教史，而不是去重现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史。这种改变与学界的主流取向是一致的。然而，在教会史领域去“发现中国历史”谈何容易！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中文史料的缺乏。与西方在华差会所保留的汗牛充栋的西文原始档案相比较，本土教会留存的中文资料不仅数量少，而且极其零散。史料的分布也大多集中于二十世纪三、四年代，民国初年的资料已是寥寥，而晚清部分就更为稀见。至于企望找到一个与差会的西文资料完全相对应、系统的教会中文资料，在学界看来几成为不可能之事。这就造成了中国基督教史界的一个怪现象，即研究的是本土的教会历史，使用的资料却主要是外国在华差会的资料。史料本身是有取向的，差会档案中传教士享有话语的支配权，在那里本土教会人士至多是配角，很多情况下甚至连配角都称不上，他们只不过是传教士教务统计表中的数据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的主观努力多难有预期之效果，其论著中差传史取向依然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地位。笔者很幸运，公元2000年前后在汕头市

档案馆发现了一批甚为珍贵的中文教会档案资料，经过几年时间的反复阅读、梳理，现已基本弄清其价值，可以说这批资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之缺憾，这批资料的整理、挖掘和使用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将相关看法整理出来，以与同仁分享。

一、岭东长老会之缘起与演变

这批史料所涉及的地区，主要是岭东地区。所谓岭东地区是指莲花山脉以东的广东东部地区，长老会岭东教区在客家地区主要是指丰顺和大埔，梅州及附近地区因系巴色会传教区，并不包括在内。除上述地区外，长老会岭东教区还包括福建上杭以及江西的信丰和安远等地。为了便于说明这批史料的价值，这里先简要介绍岭东长老会的历史。

英国长老会1856年进入岭东地区传教。在此之前，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和黎力基已先后在潮汕沿海和内地作过传教尝试，后者在澄海盐灶等地工作数年，施洗18人，^①为后来的传教运动打下了基础。1856年汕头来了两位英国传教士，一位叫宾为邻（W. C. Burns），一位叫戴德生（Hudson Taylor）。前者就是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当时的传教环境非常恶劣。^②戴德生首先离开，宾为邻在坚持数年后，亦于1861年7月离开汕头，1868年逝世于牛庄。^③宾为邻在潮汕地区的传教基本属于试验性质，绩效并不显著。^④

1858年《天津条约》签定，汕头被辟为开埠口岸，传教环境大为改善^④这一年汕头地区被英国长老会列为“教士会汕头区会”，加强了在这一地区的传教工作，先后派出多名传教士到本地区工作，教务的发展也较为顺利。根据1869年3月的

统计，当时汕头教区已有按立的牧师3名，平信徒传教士1名，本地的传道助手10名，布道站及外展站13个，教堂13座，教友141名，慕道友25名，^⑥可以说是初具规模。1872年，英国长老会在汕头教区的外展站达到15个。^⑦到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时英国长老会在本地区已有布道站和外展站22个，有组织的教会6个，教友480名。^⑧

就传教的区域论，1871年英国长老会在客家人集中的河婆创办了第一间教会，此后10年间客区的教会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五经富、三河坝和大埔等地的传教工作也很快展开。^⑨1881年客区与汕头教区初步分离，成为单独的区会，^⑩拥有9个布道站。^⑪五经富已成为客家传教区的中心。^⑫整个客区有成人教友211人。^⑬另一份统计资料则与上述略有出入，计本年有成人教友191名，加上受洗的孩童58名，20名禁领（凡教徒行为不端则被罚禁领圣餐）的教友，合计有教友269名。^⑭

从管理体制上看，1880年以前为典型的差会体制时期。自1858年汕头成为英国长老会的传道站后，岭东地区正式成为英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一个教区，从而纳入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会（F.M.C）的管理体系。在这个时期，传教士直接创立和管理本地教会。传教士与本地教会的布道人员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传教士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雇佣和解雇布道员、助手，本地布道员和助手无权参与教会行政事务的决策。在教士会内部，一般设有会正、干事和司库等职务，不过，由于早期传教士人数并不固定，时少时多，所以上述管理人员也不固定，会议也不是定期举行，但一般情况下总有一位传教士直接向差传本部负责。在组织各地堂会（亦称教会 congregations）时，在英国传教士的指导下进行选举，选出长老和执事，组成办事处，管理堂会。1871年的汕头区教会中，已选出11位办事职员，1875年又有6个堂会组织办事处。^⑮

这种差会管理体制是与本地教会的不成熟状况相适应的，其便利之处是教士会决定一切，垂直管理，传教士享有绝对的权威。这种体制是早期来华差会一般所共同采用的体制。

1881年6月8-13日，在岭东地区传教的中、外教牧人员在汕头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潮惠长老大会。通过此次大会，长老会初步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前期阶段差传体制的新型教会体制，它是由本地牧师、长老、执事和会友组成的真正本土性的教会，它与英国长老会是一种独立的平等关系，两者并不相隶属。^{①6}不过，这仅仅是在理论意义上是如此，本地教会真正要达到对先进教会的独立与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00年5月因教区扩大，堂会增加，加之语言隔阂，长老会分立为以客家人主体的五经富区长老大会，以潮汕人为主体的汕头区长老大会，原有之大会改名为潮惠长老总会。传教士亦分为两部分，分立为两个教士会，分别参加两区大会。^{①7}总会只负责主持会规，进名考试，向外交涉，主持总会之宣道事业，收取两区会之感恩银、宣道银。其他权力则集中于两区会之手中，这个时期可称之为区会集权时期。

1913年“全国长老总会”成立，这一年潮惠长老总会加入了“全国长老总会”改名为“岭东长老大会”，简称“岭东大会”，汕头和五经富两区大会则分别改名“汕头中会”和“五经富中会”。^{①8}

1927年9月29日中华基督教全国长老总会在上海清心堂开会，岭东的长老会派遣林重三、蔡融等分别代表汕头区会和五经富区会参加会议，大会决定结束中华基督教全国长老总会，参加中华基督教会。^{①9}10月1日中华基督教总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圣马利亚学校开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并取消各宗派名称。^{②0}会后，潮惠长老总会改称为“中华基督教岭东大会”，汕头区基督教长老大会改称为中华基督教汕头区

会，五经富长老大会改称为中华基督教五经富区会。上述两个区会隶属于岭东大会，岭东大会隶属于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

1943年，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倡导以“以大会为中心”之政策，同年9月，岭东大会又接到教士会通告，通告提出今后在行政上要以大会为对象，所以在第45次大会时进行调整，重新回到大会集权时期。^①为此岭东大会问题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来负责各项事业的管理，不过在大会闭会期间岭东大会常务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原来区会体制内的大部分职能都转移给岭东大会，区会一般只负责区会内部的教牧调配和财政收支。

从1856年到1951年，九十余年时间里英国长老会总共向岭东地区派出了105名传教士和医生，^②截止到1950年这些传教士共创办和协助本地宣道人员创办堂会127间，其中汕头区会88间，五经富区会35间，岭东大会宣道区4间，成人信徒10474名，^③约占当时全国总数的八十分之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长老会在植根岭东社会的过程中，其相关机构和功能多次发生变化，其名称亦随之改变，但就宗派而论，它一直属于长老宗。为简便和统一计，本文在通称时称岭东长老会，而凡涉及特定时段则一律使用当时所用之名称。

二、档案之构成及价值

岭东长老会之中文档案的形成时间起于光绪七年（1881），终于1949年。1950年后形成的部分档案文件尽管在较长时期内仍冠名长老会，然其所属关系已发生变化，归属于市宗教（局）和统战部门，且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教会已进入后宗派时期，故这

部分档案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岭东长老会档案之价值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岭东长老会之档案资料是迄今为止国内所发现的最完整、最系统的本地教会档案。从1881年6月本地教会成立起，相关会议记录即保存下来。尤为让人惊异的是，潮惠长老总会及后来的岭东大会历次会议记录、汕头大会及后来的汕头中会和区会会议记录、汕头堂会长执会、长老会会议记录、调理宣道会会议记录，均十分完整地保留下来，数十年间竟然无一次缺漏。且这些记录绝大多数是以稿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就更为难得。其中清末部分全为稿本，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所发现的最早的本地教会的稿本文献。

岭东长老会之档案资料不仅完整，而且甚为系统。举凡当时岭东大会和汕头区会所附设机构的档案均保存下来。如大会常务委员会、理监事会联席会议、会章委员会、服务委员会、事功委员会、青年团契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青年团契协进会会员大会、福音医院创办人代表会等机构会议与活动均记载无缺。汕头区会之财政部、传道部、续行部、产业部、文字部、慈善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会议记录也比较齐全。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现存档案资料为深入分析近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材料，也为人们观察本土教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案例。中国本地教会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国基督教史的中心内容，但这一部分恰恰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较为薄弱的部分。岭东长老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中文形式系统提出“三自”口号的教会，“汕头体制”曾在1907年上海的传教士百年大会上被重点介绍。^②在当时已引起教会的广泛关注，此后其在经济自养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时人所瞩目。完全可以说，岭东长老会是近代中国教会推进自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对于这样一个典型个案的解剖，可以深入探讨

中国近代基督教会本土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所遭遇的困境。

教会自立运动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其间有多位学者对中国教会自立运动作过宏观上的类型分析，但仔细审视这些分类，发现其立论基础实有不足，关键是缺乏对各种类型的实证研究，故结论不免稍嫌武断。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资料的缺乏，尤其中文档案的缺乏，使得学者难以深入探究，只能作一粗略的划分。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基督教史的一个重大缺陷，即人们对中国教会的自立进程认识不清晰。而岭东个案恰能弥补这种缺陷和缺憾。

第三，与一般教会档案所呈现的种类单调、行文粗略特点不同，岭东长老会档案资料总体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相关历史场景的细节描述极为精细，给研究者以充分的解读空间。这些档案中既有公文告示、也有私人书札，即便是会议记录有的也很有特色，尤其是会议中的冲突、争执记载非常详尽，这在一般中文教会档案中是很少见的。有时围绕一个事件的函牍批示居然达到上百件左右，各方的立场在函稿中得到充分展示。^{②9}

其中不少案例所关涉的并不仅仅是教会，而且包括潮汕地方政府、粤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不仅关系本国，还包括国际交涉。

第四，大量保留了教会实际运作中的第一手资料。这类资料包括各种表格数据和统计数据。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清末各年度的统计资料，里面既有教牧、信徒人数，各种捐款数额，也有教会事业如学校、医院等的统计数据，为完整地考察本地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数据资料。此外，各堂会聘请教牧的聘书，教牧人员签领实物、薪金、补助的各种收据，还有教友要求挽留或改聘教牧的联名信件，这其中这些都是原件和手稿。教会举行各种活动所留下的原始资料亦复不少。

第五，本地教牧、长老多留有传记。其中，生者由自己撰写，已去世者则由派专人草拟初稿，在大会正式宣读并获会议通过后，载入会议记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大会又统一对相关传记进行了整理。这些传记资料是展现本土教会主体性的直接证明，通过分析这些资料，可以清晰地测定本地教牧人员在教会的创建、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同时，这些传记一般都会描述传主的家庭及子女教育乃至婚姻的情况，这也为深入分析基督徒家庭或家族的内部关系和教会内部的人脉关系提供了便利。除了教牧、长老外，一些有影响的平信徒尤其是女信徒也有传记。

第六，汕头区会的所有堂会都撰有史略。1949年，为了庆祝福音入潮一百周年，大会发布通告，要求所属堂会都要撰写堂会史略，并且就编写体例作了专门的规定。汕头区会所属87个堂会全部都撰写了堂史。堂会是教会的基础，不弄清楚基层堂会的缘起与发展，尤其是母堂与子堂之间的关系，本地信徒在创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很难弄清教会的发展脉络。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岭东长老会留下了比较系统的中文档案？从现存的中文会议记录来看，长老会高度重视每次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和严肃性，每次会议开幕时都会由纪事宣读前会议记录，而每次会议结束时都要宣读本次会议的记录，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认可，方准登册。同时，长老会甚为重视历史沿革和记录，每逢教会体制有重大变化时，都会追溯历史，并指出当下行动的合理性。而每逢有教牧、传道人士逝世也都指派专人为其作传，并在大会宣读，获准后载入会议记录。这种重视文件和历史的传统可能是岭东长老会留下比较系统史料的原因之一。但是问题是英国长老会在福建省还设有传教区，但该地区却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中文史料。即便是同属于岭东大会系统的汕头区会和五经富区会所留下的史料也不尽相同。大体而

言，汕头区会的资料甚为完整、系统。而五经富区会的资料则零散一些，且多集中于三、四十年代。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教会档案在档案分类上竟然分为两大系统。一部份为民国资料，一部份则为档案。后者系从公安局移交而来，而前者从何而来，并不清楚。且就史料价值而言，“资料”部分，反而比“档案”更有价值。

三、中、英档案史料的对比分析

岭东长老会档案之价值不仅表现在其作为中文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上，而更在于其提供了差会之英文档案资料无法涵盖的一种独特的史料取向。由于相关史料是本地教会所留存，其所反映的基本上本地教会的活动，尽管传教士很多时候也参与了这些活动，但对这些活动的记录所逐渐彰显的则是本地教会的主体性，反应的是本地教会的成长。对于研究者而言，可以从这种史料留存中很自然地发现一种新的研究教会史的视角。简而言之，只有用对比的眼光来审视两种史料，考察其对本地教会成长所表达的不同关怀与取向，才能充分彰显这批中文档案的意义与价值。

对英国长老会而言，本地教会自成立起即为其友会，双方应属独立、平等之关系，但实际上，在较长时间内英国传教士在岭东长老会居于很重要的地位。而本地教会也一直将英国长老会视为母会，自己则为子会，或称前者为先进教会，而称自己为后进教会，在经济上对英国长老会颇有仰赖。那末，其中本地教会与英国长老会所属之宣道会究竟是什么关系，本地教牧人员与传教士是一种关系，差会与教会的权力移交进程到底是怎样进行的，本地教会在经济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依赖差会，其所称之自养究竟有何成效。这里拟围绕上述问题分别从人

事、经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英史料对此问题的叙述。

在本地教会成立之前，即1881年以前没有留下任何中文史料，而当时本地教会人员中也缺乏精通英文者，所以留存下来的传教资料几乎全部是传教士撰写的，其中虽不乏对本地堂会和传道人员及信徒的介绍，但其取向则多是差传性的，传教士本人在全部活动中占据着中心和主导地位。其实，在早期，尽管传教士与本地传道人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地传道人员和信徒在传教活动中完全是被动的角色，一些情况下可能完全相反，倒是差会和传教士在被动地配合，进而沦为本地乡村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性角色。²⁶然而，传教士在差传体制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所掌控的经济和人事大权毕竟使得他们获得了对本地教务发展的决定权。

这种局面在本地教会成立之后，逐步被改变。根据中文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在潮惠长老大会的成立大会上，本地传道人员即在会议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陈树铨、林芳担任大会的正、副纪事，且与会长老均被托担任各项事务。当然，会议的主导者仍是施饶理、金护尔、卓为廉、汲约翰、纪多纳等传教士，因为几乎所有的议案都是由他们提出的，而本地人士中只有林旗提出了一项议案，且是一项关于下次会议时间的程序性提案²⁷不过，在差会档案中并没有专门记录这次会议，²⁸多年后，与会的汲约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只是一般性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并对“三自”主张的意义进行了说明，并没有提及与会的本地教会人士的贡献。²⁹

在此后的会议中，我们看到，本地传道人员中按立圣职者渐次增多，而在会议中渐趋主动。1882年，陈树铨成为潮惠长老大会首位进名牧师，³⁰随后即被孚山聘任，³¹并于当年正式按立。³²1886年大会举行时，陈树铨曾代理会正。³³1892年彭启峰才正式担任大会会正，³⁴不过直至清朝最后几年亦是本地教牧

与传教士交替担任会正，而以传教士担任的次数居多，到民国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本地教牧担任大会和中会会正的次数多于传教士。从大会的议案看，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本地教牧与长老提出的议案数量已经与传教士基本持平，^{③5}且在具体的议事过程中当传教士提出一个议案，而本地教牧提出不同意见，按照规则必须投票决定时有时传教士的议案也会被否决，^{③6}这表明本地教牧长老在教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在上升。与此同时，由本地牧师与传教士一同担任出席各种外地乃至外国会议的正副代表的情况也逐渐多起来，且以本地人士为主。^{③7}不过，真正反映教会权力的是各种常设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教师的委派，这项权力是长期掌握在教士会手中，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移交，至于本地教会的财权则基本掌握在本地教牧人员手中，其间虽然有传教士也管理过传道银收支帐簿，但传教士本人并无对该银项的支配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地教会在财政上实现了完全自主，因为本地教会的收入只是教会全部收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要仰赖宣道会的拨款。1918年汕头中会会议记录中提供了各部委办的名单，本地教牧人员不仅占多数，且多数正委办（按：即部长）为本地人，传教士只在学校、巡视和鼓励布道等三个部门担任正委办。^{③8}到1928年时岭东长老大会第30次会议时，大会所属各部委办本地不仅占到绝对多数，且教务、财政等重要部门均由本地人士控制。^{③9}从相关中文档案可以看出，岭东长老会内部权力之变化转移时逐步进行的，本地教会力量的迅速增长是这种变化转移的基本动力。

考察英国长老会方面的档案，汕头教士会似乎享有对一切问题的最终决定权，本地教会基本上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本来，汕头教士会每年举行夏、冬两次会议，会议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汕头区会和岭东大会之后。这样安排是为了方便讨论区会和大会所提出的希望由教士会来协调和解决的问题。由于此前

传教士已经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区会和大会的会议，所以他们对教会的要求是十分清楚的，讨论问题自然具有针对性。就程序而论，岭东大会或汕头区会因系独立教会，所以它们不会直接向教士会提出要求，而是直接向英国长老会宣道会提出要求，但是这些正式的信函和公文必须通过教士会转交，这样教士会就会先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一个决议再报宣道会本部审批，所以教士会并非是凌驾于本土教会之上的一个机构，它只是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教士会对区会和岭东大会的要求只有向英国长老会转达的义务，并无直接裁断的权力，传教士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教会与宣道会之间的“联络官”。^④至于权力转移，从传教士的信件中看到的传教士主动地将权力转移给本地教会，并且对本地教会保持一种平等的、合作的态度。^④

在经济上同样是如此，本地教会的档案资料所着重强调的是本地教友的捐赠，这种捐赠是本地教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教会实现自立的物质基础。下面试以潮惠长老总会的捐款统计作一说明。

表1：潮惠长老总会属区会捐款对照一览表（1901-1924）

（单位：元/人）

年度	汕头大会					五经富大会					总计			备注
	信徒人数	各类捐款	人均捐款	其中传道捐	人均捐款	信徒人数	捐款金额	人均捐款	其中传道捐	人均捐款	信徒总数	捐款总额	人均捐款	
1901	2174	6223	2.9	2632	1.2	780	1868	2.4	677	0.9	2954	8091	2.7	汕档 ^④
1901	2174	6223	2.9	2632	1.2	780	1868	2.4	677	0.9	2954	8091	2.7	汕档 ^④
1902	2332	8617	3.7	2935	1.3	837	2042	2.4	650	0.8	3169	10659	3.4	汕档 ^④

1903	2370	10276	4.3	3655	1.5	897	2870	3.2	984	1.1	3267	13146	4.0	汕档 ^④
1904	2552	9582	3.8	4160	1.6	972	3054	3.1	863	0.9	3524	12636	3.6	汕档 ^④
1905	2773	11941	4.3	4302	1.6	1012	2866	2.8	840	0.8	3785	14807	3.9	汕档 ^④
1906	2934	12034	4.1	4755	1.6	1060	4333	4.1	870	0.8	3994	16367	4.1	汕档 ^④
1907	3117	11272	3.6	4865	1.6	1081	3600	3.3	961	0.9	4198	14872	3.5	汕档 ^④
1908	3268	11812	3.6	5088	1.6	1122	4718	4.2	1011	0.9	4390	16530	3.8	汕档 ^④
1909											4527	18925	4.2	汕档 ^④
1910	3476	13102	3.8	6181	1.8	1250	4122	3.3	1128	0.9	4726	17224	3.6	汕档 ^⑤
1911	3660	13490	3.7	6041	1.7	1341	4558	3.4	1436	1.1	5001	18048	3.6	汕档 ^⑤
1912	3806	14130	3.7	6718	1.8	1351	4831	3.6	1381	1.0	5157	18961	3.7	汕档 ^⑤
1913	3998	16101	4.0	7785	1.9	1400	4761	3.4	1180	0.8	5398	20862	3.9	汕档 ^⑤
1914	4184	19223	4.6	8386	2.0	1436	4707	3.3	1354	0.9	5620	23930	4.3	汕档 ^⑤

说明：捐款金额均取整数，人均捐款保留到小数点后1位数。信徒均为领餐者，被禁领餐的会友不在此列。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汕头大会无论是就整体力量，还是信徒的平均捐款各项数据基本都要高于五经富大会，其原因在于汕头大会辖区多平原和城市教会，信徒相对比较富裕，自然对教会的捐献就相对多一些，而五经富大会辖区基本上属于客家地区，多山区和农村教会，自然要贫弱一些。然两大会的捐款都在增长，到二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本地为什么会出现多所堂会要求自立，乃至与教会中枢分庭抗礼的局面。

而在差会档案中我们看到的主要差会对本地教会在经济上的扶植和帮助，各种统计似乎表明，差会的拨款是本地教会生